

第二次人口转型与低生育率陷阱

证券研究报告

2024年01月21日

韩国经验启示录

• 核心结论

一、生育率的持续下行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全球化趋势

少子化已成为全球普遍趋势，其中韩国的低生育问题最为严重。2021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2.27，接近2.1的世代更替水平。目前多数发达经济体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少子化问题，其中韩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最为严重，2022年以0.78的总和生育率全球“垫底”。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少子化的共性原因也随之改变。1) 第一阶段：婴儿死亡率下降抑制家庭生育意愿，节育措施的推广延长生育时间的间隔，二者共同驱动总和生育率由过去的6-7回落至3-4。2) 第二阶段：根据人口学家考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家庭财富的流动方向发生逆转，生育行为由“投资”转变为“消费”。同时，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也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明显增加，家庭倾向于减少孩子的数量并提高孩子的“质量”。在此阶段，总和生育率将向2.1的世代更替水平回归。3) 第三阶段：Van de Kaa等（1987）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认为个体主义的发展和家庭观念的转变使现行婚姻制度受到较大冲击，传统家庭功能被逐渐瓦解，进而总和生育率持续下行，最终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二、少子化趋势下，为何韩国生育率全球垫底？

东亚经济体“压缩式”工业化发展模式下，生存优先级高于生育。与多数东亚国家类似，韩国仅花费数十年，就完成了早期发达国家经历几个世纪才实现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式”工业化不仅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会发生急剧转变。这一层面的转变得益于“后发优势”，但与东亚传统的文化理念和婚姻家庭观念造成了冲突。

劳动力市场内卷导致工作时长不断增加。韩国财阀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此外，韩国稳定的雇佣制度也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逐渐走向崩溃，造成韩国“正规职”和“非正规职”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韩国人均工作时长在OECD国家位居前列。

韩国养育子女成本高于其他主要国家。据育娲人口测算，在韩国将一个孩子抚养至18岁所花费的成本约为人均GDP的7.8倍，远高于新加坡、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该国劳动力市场激烈过于竞争，父母不得不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少生优育成为家庭的理性选择。

高房价和家庭债务负担也是造成韩国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亚洲金融危机造成韩国大量人口失业，受低利率环境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不少低收入群体成为加杠杆的主力。由于居民收入恢复速度较慢，无力偿还债务的民众越来越多。2022年韩国家庭债务占名义GDP比重已高达107.7%，多数国家则保

分析师

边泉水	S0800522070002
13911826169	
bianquanshui@research.xbmail.com.cn	
宋进朝	S0800521090001
15701005636	
songjinchao@research.xbmail.com.cn	

联系人

张馨月	
15625292560	
zhangxinyue@research.xbmail.com.cn	

相关研究

4季度动能放缓，稳增长力度仍需加大—2023年4季度和12月经济数据点评 2024-01-17
“降息”预期落空怎么看？— 2024-01-16
政策扩张力度有待提升—2023年12月金融数据点评 2024-01-13
出口延续正增长—2023年12月贸易数据点评 2024-01-13
通胀边际回升—2023年12月通胀数据点评 2024-01-12

持在 70% 以下。韩国独有的全租房制度则助推房价上涨，进一步加剧家庭债务负担。过快上涨的房价明显抑制韩国家庭的生育意愿，根据韩国国土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住宅价格上涨对出生率下跌的影响研究》，房价每上涨 10%，将导致未来 7 年总和生育率减少 0.14。

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明显抑制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尽管韩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正在收窄，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依然较为严重。目前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已经位列 OECD 国家之首。性别不平等将提高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为应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韩国职业女性普遍选择推迟婚育年龄，造成生育率进一步下滑。

此外，韩国政府的人口政策转向过慢，错过了最佳的政策介入期。上世纪 60 年代，韩国曾出台节制生育政策，到 2003 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1.19，被认为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在此之后，韩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但韩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已回落至较低的水平。尽管此后韩国将人口政策总体规划的执行视为国家头等大事，在鼓励生育方面的财政投入颇多，但也并未逆转少子化的整体趋势。

三、韩国长期少子化有何影响？

从供给侧看，少子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进而拖累经济增速。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已于 2016 年见顶后回落，2022 年已降至 71% 左右。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不足将直接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长期少子化导致的人口老龄化也将降低社会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资本要素不足也会拖累经济发展。

从需求侧看，少子化对消费需求存在一定抑制作用。从韩国经验看，自 1998 年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以来，韩国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中枢整体回落，2011-2021 年增速均低于 5%。

少子化可能导致经济重心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长期少子化将导致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进而增加社会总体养老需求。养老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促进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

从韩国经验看，少子化将加大社保体系和财政负担，同时可能引起公共服务短缺。目前韩国养老金支出占 GDP 比重逐年提升，同时由于老龄人口得到的税后转移支付相对不足，老年贫困的问题也较为严重。此外，韩国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因缺少生源而纷纷关门。长期少子化还可能影响国防安全，韩国军事人力管理局官员预计，韩国 2032 年起将面临兵源不足的难题。

此外，少子化可能增加企业用工成本，抑制创新活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可能推动薪酬上涨，长期少子化造成的劳动力老龄化也意味着雇主需要对工作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对雇佣成本造成压力。此外，韩国企业通常采取内部研发，这意味着创新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员工储备。由于中小企业缺乏资源优势，在人才吸引力方面也与大企业存在明显差距。随着未来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日益加剧，中小型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或被拖累。

风险提示：人口预测数据不准确，少子化对供需两端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不清晰，对鼓励生育政策作用理解不到位。

索引

内容目录

一、 生育率的持续下行是难以逆转的全球化趋势	5
1.1 少子化已成为全球普遍趋势，韩国低生育率问题尤为严重	5
1.2 全球少子化的共性原因：从“人口转变”到“第二次人口转型”	7
二、 少子化趋势下，为何韩国生育率全球垫底？	10
2.1 劳动力市场内卷导致工作时长不断增加	12
2.2 养育成本高昂	13
2.3 高房价和家庭债务负担	14
2.4 性别不平等	15
2.5 人口政策转向过慢	17
三、 韩国长期少子化有何影响？	19
3.1 韩国少子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9
3.2 韩国少子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20
3.3 韩国少子化对企业部门的影响	20
四、 风险提示	21
参考文献	22

图表目录

图 1：全球总和生育率情况对比	6
图 2：各大洲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	6
图 3：全球前 20 经济体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以 2022 年 GDP 总量排名）	6
图 4：2000 年后韩国出生率迅速降至全球较低水平（‰）	7
图 5：韩国女性结婚率与平均生育年龄	7
图 6：韩国 2021 年起转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7
图 7：全球第一次人口转变历程	8
图 8：非洲国家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率持续下降	8
图 9：全球女性预期受教育年份逐步与男性持平	9
图 10：15-64 岁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幅度较大（%）	9
图 11：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型（‰）	9
图 12：1960-1990 年韩国工业部门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迅速上升	10
图 13：韩国经济增速与总和生育率同步“下台阶”	11
图 14：“压缩式”工业化发展期和成熟期韩国人均 GDP 增速较高	11
图 15：韩国高等院校入学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	11

图 16: 韩国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工资收入差距较大 (万韩元)	12
图 17: 韩国外债占 GDP 比重和韩元汇率	12
图 18: 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失业率迅速上升	13
图 19: 韩国财富不平等程度加剧	13
图 20: 韩国全年实际工作时长位居 OECD 国家前列 (小时)	13
图 21: 韩国养育成本高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	14
图 22: 韩国本科入学率超过 70%	14
图 23: 韩国家庭债务负担持续上升	14
图 24: 2022 年韩国家庭债务负担高于多数主要经济体	14
图 25: 全球主要城市房价收入比与总和生育率负相关 (2021 年)	15
图 26: 韩国主要城市房价收入比与总和生育率负相关 (2022 年)	15
图 27: 韩国性别不平等程度	16
图 28: 韩国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高于男性 (%)	16
图 29: 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低于 OECD 国家平均值	16
图 30: 2022 年韩国性别工资差距位列 OECD 国家之首	17
图 31: 性别工资差距与总和生育率负相关 (2022 年)	17
图 32: 韩国生育政策调整历程	18
图 33: 韩国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率同步下降	18
图 34: 韩国出生性别比一度失衡	18
图 35: 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回落	19
图 36: 韩国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中枢回落	19
图 37: 韩国养老金支出占 GDP 比重不断增加	20
图 38: 韩国人口抚养比已超过 0.4	20
图 39: 韩国研发支出强度高于多数发达国家 (2021 年)	21

生育是维系人类族群正常繁衍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现如今，生育率的下降已成为全球普遍趋势，由此引发的少子化问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均有体现，有的已经列入公共部门重大议事日程之中。在众多少子化国家和地区中，韩国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全球罕见，是研究少子化问题无法回避的经典案例。在本篇报告中，我们将围绕韩国低生育率的成因这一核心问题，从全球共性视角和韩国特性视角两个维度进行剖析，并进一步探究，在韩国生育率快速下行的50余年中，其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一、生育率的持续下行是难以逆转的全球化趋势

总和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育龄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是国际上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通常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即一对夫妻平均至少要生育 2.1 个子女，才能保证人口规模不变。

1987 年，Van de Kaa 和 R. Lesthaeghe 等人口学家为解释欧洲生育率为何普遍下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型”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理论¹。该理论从社会文化视角阐述了人口转变背后的逻辑，其认为随着个体主义的实现和家庭观念的转变，婚姻与生育之间的关联正不断弱化，传统的家庭功能被进一步瓦解，进而导致总和生育率降低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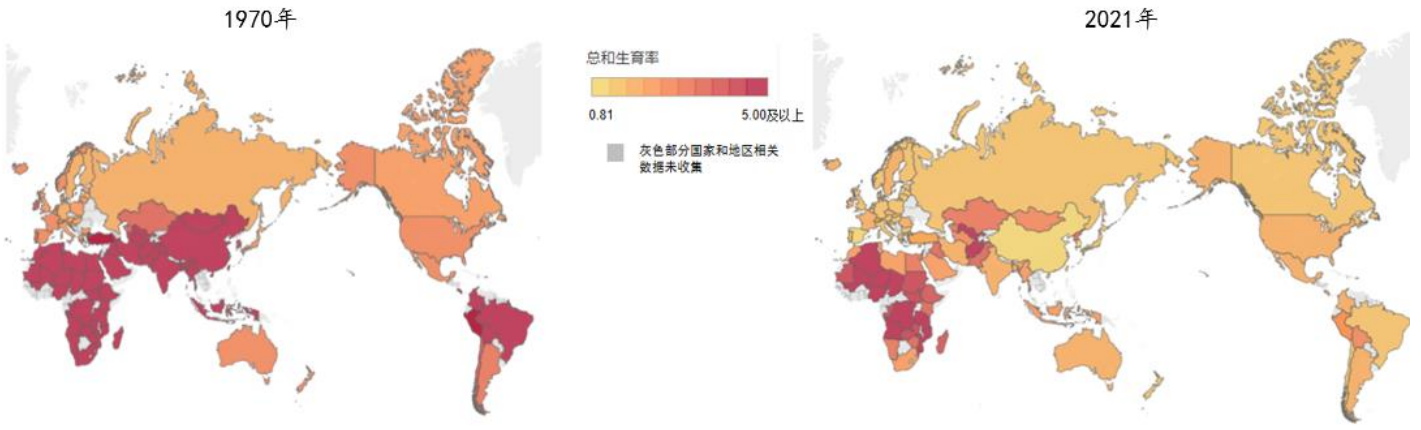
然而，部分国家在总和生育率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下方后，情况并未好转，生育率甚至迭创新低。针对这一现象，2005 年奥地利学者鲁茨再次提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其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 1.5 以下，那么扭转生育率下行的趋势将变得相当困难，韩国即是典型的例证。

1.1 少子化已成为全球普遍趋势，韩国低生育率问题尤为严重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少子化已成为世界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到 2021 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已接近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少子化迅速成为全球的整体趋势。全球总和生育率由 1970 年的 4.89 持续下降至 2021 年的 2.27，已接近世代更替水平。从主要经济体来看，2021 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66、1.52、1.30、0.81 和 1.16。目前欧美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 1.3-1.7 这一区间，韩国、日本和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则在 0.8-1.3 左右，即便是印象中人口基数庞大且增长较快的传统生育大国印度，其总和生育率也在 2020 年下降到了 2.05，首次低于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西亚等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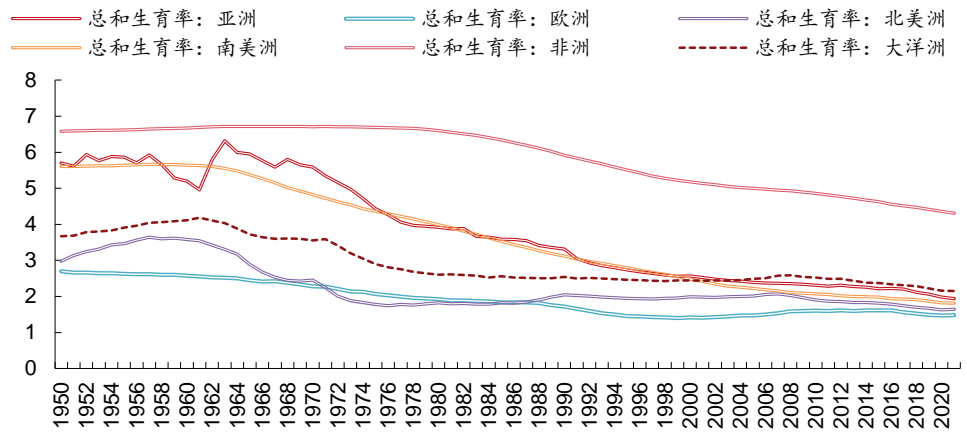
¹ Van De Kaa DJ.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 Bull. 1987 Mar;42(1):1-59. PMID: 12268395.

图1：全球总和生育率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if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2：各大洲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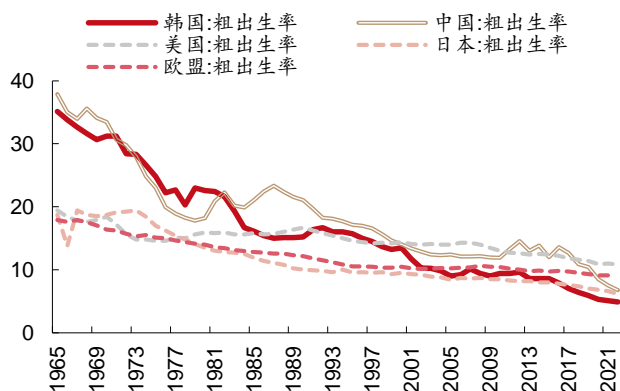
图3：全球前20经济体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以2022年GDP总量排名）

国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美国	2.06	2.03	2.02	2.05	2.05	2.06	2.11	2.12	2.07	2.00	1.93	1.89	1.88	1.86	1.86	1.84	1.82	1.77	1.73	1.71	1.64	1.66
中国	1.63	1.56	1.57	1.57	1.60	1.62	1.64	1.67	1.70	1.71	1.69	1.67	1.80	1.71	1.77	1.67	1.77	1.81	1.55	1.50	1.28	1.16
日本	1.36	1.33	1.32	1.29	1.29	1.26	1.32	1.34	1.37	1.37	1.39	1.39	1.41	1.43	1.42	1.45	1.44	1.43	1.42	1.36	1.33	1.30
德国	1.38	1.34	1.35	1.34	1.36	1.34	1.33	1.37	1.38	1.36	1.39	1.39	1.41	1.42	1.47	1.50	1.60	1.57	1.57	1.54	1.53	1.58
印度	3.35	3.30	3.22	3.12	3.05	2.96	2.86	2.78	2.72	2.67	2.60	2.54	2.47	2.41	2.31	2.29	2.27	2.20	2.18	2.11	2.05	2.03
英国	1.64	1.63	1.63	1.70	1.75	1.76	1.82	1.86	1.91	1.89	1.92	1.91	1.92	1.83	1.81	1.80	1.79	1.74	1.68	1.63	1.56	1.56
法国	1.89	1.90	1.88	1.89	1.92	1.94	2.00	1.98	2.01	2.00	2.03	2.01	2.01	1.99	2.00	1.96	1.92	1.89	1.87	1.86	1.83	1.83
俄罗斯	1.20	1.22	1.29	1.32	1.34	1.29	1.30	1.42	1.50	1.54	1.57	1.58	1.69	1.71	1.75	1.78	1.76	1.62	1.58	1.50	1.50	1.49
加拿大	1.51	1.54	1.52	1.55	1.56	1.58	1.63	1.67	1.70	1.69	1.65	1.63	1.63	1.61	1.61	1.60	1.59	1.55	1.51	1.47	1.41	1.43
意大利	1.26	1.25	1.27	1.29	1.34	1.34	1.37	1.40	1.45	1.45	1.46	1.44	1.43	1.39	1.37	1.35	1.34	1.32	1.29	1.27	1.24	1.25
巴西	2.25	2.18	2.10	2.02	2.00	1.97	1.93	1.88	1.84	1.82	1.81	1.80	1.77	1.75	1.77	1.78	1.71	1.74	1.75	1.70	1.65	1.64
澳大利亚	1.76	1.74	1.76	1.75	1.77	1.81	1.91	1.96	1.98	1.97	1.93	1.93	1.92	1.85	1.83	1.81	1.75	1.74	1.74	1.66	1.58	1.70
韩国	1.48	1.31	1.18	1.19	1.16	1.08	1.13	1.26	1.19	1.15	1.23	1.24	1.30	1.19	1.21	1.24	1.17	1.05	0.98	0.92	0.84	0.81
墨西哥	2.72	2.67	2.62	2.58	2.54	2.50	2.46	2.42	2.39	2.36	2.34	2.32	2.29	2.27	2.21	2.14	2.09	2.04	2.00	1.92	1.91	1.82
西班牙	1.22	1.23	1.25	1.30	1.31	1.33	1.36	1.38	1.45	1.38	1.37	1.34	1.32	1.27	1.32	1.33	1.34	1.31	1.26	1.23	1.19	1.19
印尼	2.54	2.50	2.46	2.43	2.42	2.43	2.45	2.49	2.48	2.46	2.45	2.50	2.49	2.43	2.39	2.35	2.31	2.26	2.23	2.21	2.19	2.17
沙特	4.12	3.91	3.71	3.50	3.34	3.24	3.21	3.18	3.06	2.95	2.85	2.81	2.78	2.74	2.69	2.64	2.59	2.58	2.55	2.50	2.46	2.43
荷兰	1.72	1.71	1.73	1.75	1.72	1.71	1.72	1.72	1.77	1.79	1.79	1.76	1.72	1.68	1.71	1.66	1.66	1.62	1.59	1.57	1.54	1.62
土耳其	2.50	2.53	2.32	2.23	2.22	2.22	2.23	2.19	2.18	2.16	2.14	2.13	2.15	2.17	2.20	2.19	2.18	2.14	2.05	1.97	1.92	1.89
瑞士	1.50	1.38	1.39	1.39	1.42	1.42	1.44	1.46	1.48	1.50	1.52	1.52	1.52	1.52	1.54	1.54	1.54	1.52	1.52	1.48	1.46	1.5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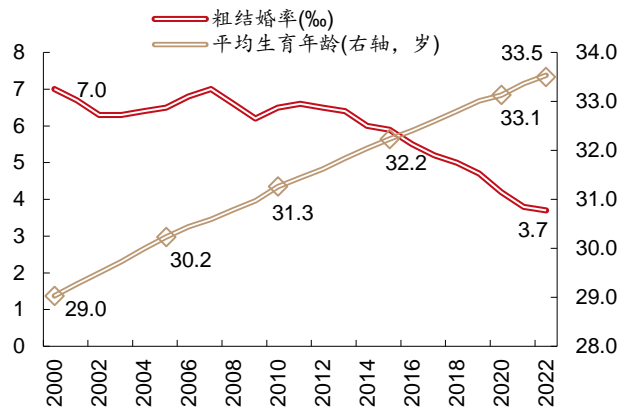
尽管少子化已成为全球化的普遍趋势，但不同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存在差异，其中韩国的低生育问题最为严重。202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0.78，这意味着韩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已不足0.8个。迄今为止，韩国已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2年出生率仅有4.9%，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出生率分别为6.8%、6.2%和10.9%。与此同时，韩国女性的生育年龄也日渐推迟，2022年韩国平均生育年龄为33.5岁，结婚率也降至3.7%，而2000年韩国的结婚率为7%。随着少子化问题的日趋严重，到2020年韩国已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尽管韩国政府出台各项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韩国的人口危机依旧没有缓和的迹象。

图4：2000年后韩国出生率迅速降至全球较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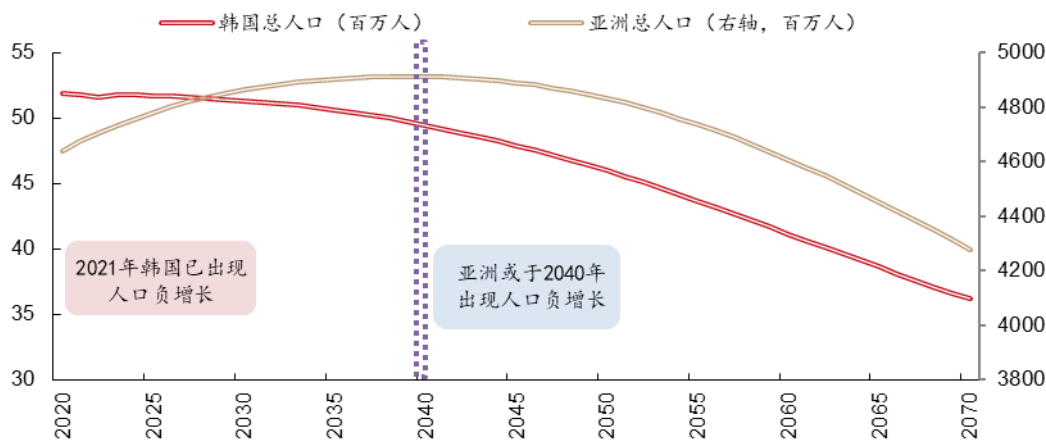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find，韩国统计局，朝日新闻，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5：韩国女性结婚率与平均生育年龄



资料来源：韩国统计局，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6：韩国2021年起转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资料来源：Wind，联合国人口展望，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1.2 全球少子化的共性原因：从“人口转变”到“第二次人口转型”

全球的少子化问题由来已久，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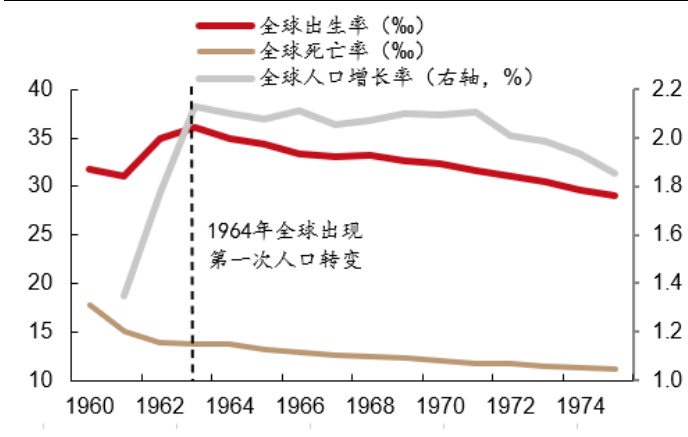
第一阶段：婴儿死亡率下降和节育措施的推广共同驱动生育率回落。Notestein（1945）率先提出了“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action）的概念²，即在婴儿死亡率下降后，

² Notestein, F. W. (1945). Population — The Long View. In Theodore W. Schultz, Ed., Food for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 请务必仔细阅读报告尾部的投资评级说明和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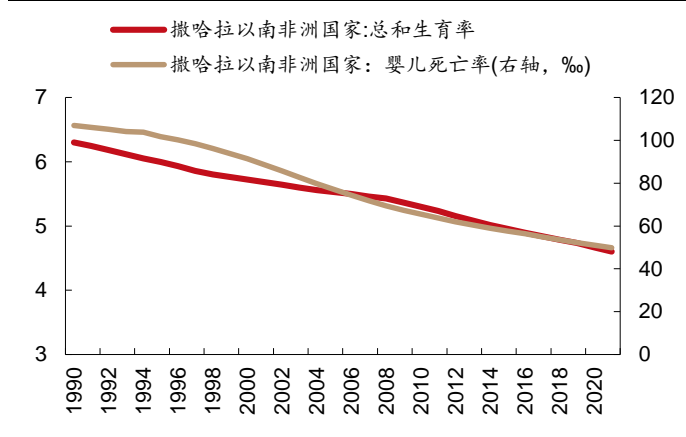
出生率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惯性，进而人口增速提升；随后，死亡率的下降将触发生率持续稳定回落。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高出生率将降低私有储蓄和投资率，进而导致人均实际收入下降，抑制家庭的生育意愿³。此外，随着节育措施的推广，育龄妇女倾向于延长生育时间间隔，这也导致了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当前非洲国家的生育率变化仍处于这一阶段，即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迅速从过去的6-7下降到3-4。

图7：全球第一次人口转变历程



资料来源：if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8：非洲国家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率持续下降



资料来源：if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第二阶段：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家庭财富的流动方向发生逆转，生育行为由“投资”转变为“消费”。

根据人口学家考德威尔（John Charles Caldwell）的财富流理论（wealth flow theory）⁴，在传统的家庭生产方式下，儿童从幼年就参与家庭经济活动，并为父母提供养老保障，财富整体上是子辈流向父辈。以尼日尔为例，该国工业基础薄弱，80%以上民众从事农业，生产方式以小农经济为主，财富流向已然是从子辈流向父辈，因此尼日尔也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生产方式由原本的家庭化转变为社会化，父辈逐渐失去对子女经济收益和消费的控制，养育子女成本提升。此外，随着保险制度的推行，家庭养老支撑作用减弱。生育行为不仅不会为父辈带来净财富收益，反而会形成经济负担。经过理性的判断后，父辈将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

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也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明显增加，家庭倾向于减少孩子的数量并提高孩子的“质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教育的性别差距显著缩小，全球女性预期受教育年份由1970年的6.7年提升至2020年的12.5年，与男性的预期受教育年份相等。与此同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迅速增加，这造成生育的机会成本明显增加。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认为，生育机会成本的提升将使得孩子成为具有较大需求价格弹性的“耐用消费品”，家庭会倾向于减少孩子的数量并且提高孩子的“质量”，从而达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⁵。在此阶段，总和生育率将向2.1的世代更替水平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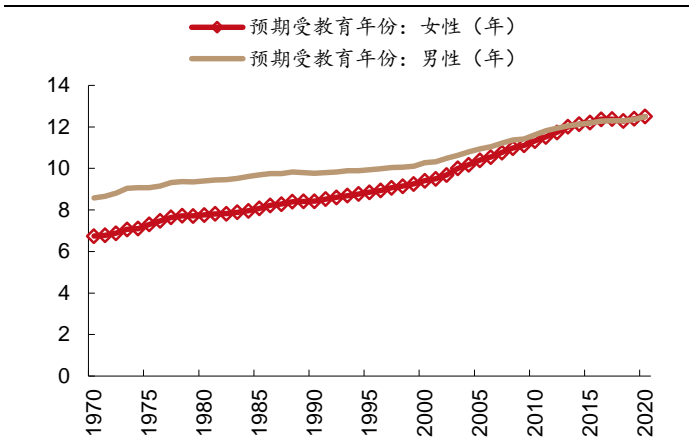
³ Petersen W. Coale and Hoover,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ook Review)[J].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59, 18(4): 524.

⁴ Caldwell, JC. (1976). Toward A Restatemen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3/4), 321-366.

⁵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 家庭论[M]. 商务印书馆,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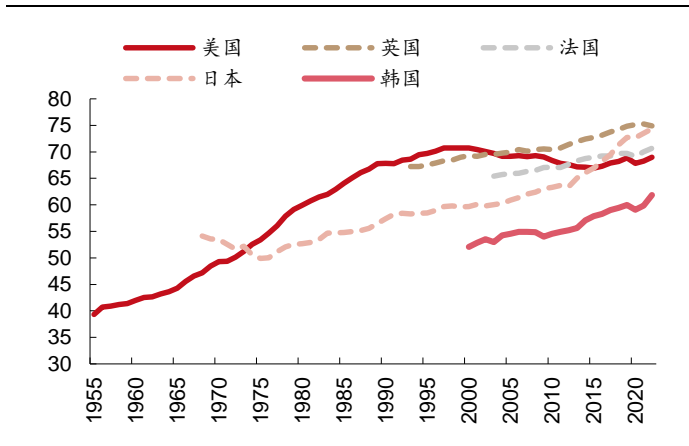
8 | 请务必仔细阅读报告尾部的投资评级说明和声明

图9：全球女性预期受教育年份逐步与男性持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10：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幅度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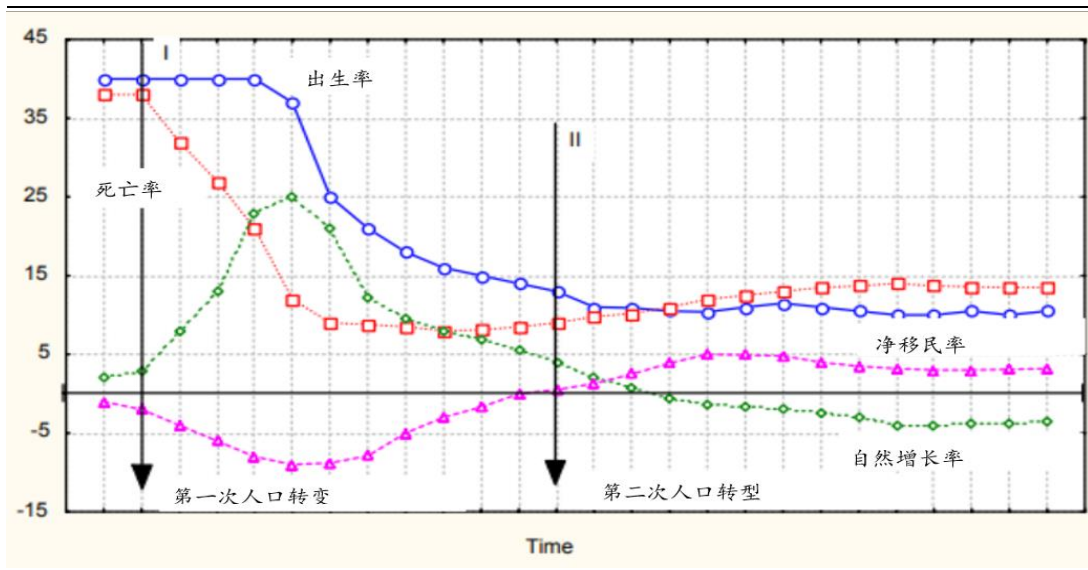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OEC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第三阶段：观念的改变推动了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最终引起生育率持续走低。

经典人口转变指的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变化的过程，迄今为止，全球多数国家已完成这一转变。根据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生育率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时就会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维持大致相等的状态，人口规模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这一理论却并不能解释为何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达到世代更迭水平后仍然持续下降，最终保持在1.3-1.7左右的水平。

Van de Kaa 和 R. Lesthaeghe 等（1987）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认为传统家庭功能的瓦解是欧洲国家的生育率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随着个体主义的发展和家庭观念的转变，现行的婚姻制度受到较大冲击，婚姻与生育之间的关联正不断弱化，进而总和生育率持续下行，最终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图11：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型（‰）



资料来源：Van de Kaa(1999)⁶，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⁶ Van de Kaa D J. Europe and its population: the long view[M]//European populations: Unity in diversity.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9: 1-49.

9 | 请务必仔细阅读报告尾部的投资评级说明和声明

二、少子化趋势下，为何韩国生育率全球垫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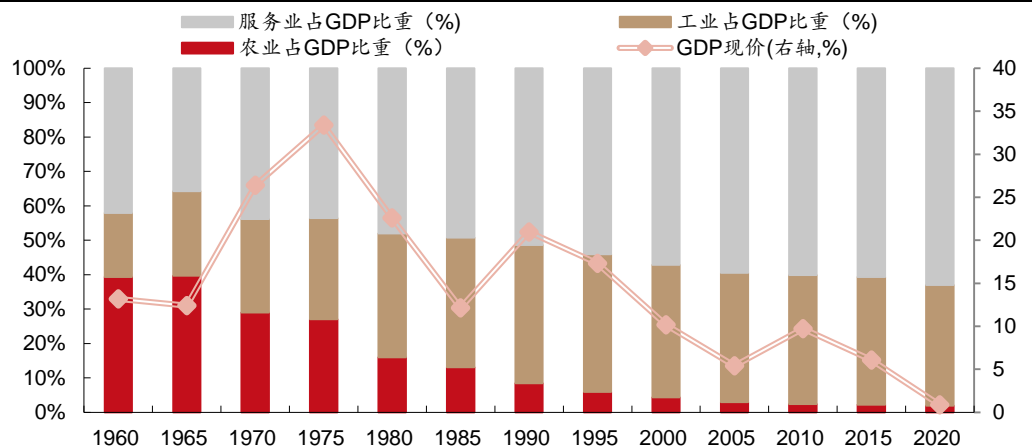
上述原因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为何少子化已成为全球性趋势，但依然无法充分说明韩国生育率下降到 0.8 以下超低水平的真实原因。而且，近年来，全球唯有东亚经济体普遍陷入了“超少子化”困境，饱受“低生育率陷阱”魔咒的困扰，一度也成为宏观经济研究和社会政策领域关注的热点议题。

东亚经济体“压缩式”工业化发展模式下，生存优先级高于生育

近几十年来，东亚国家普遍通过“压缩式”工业化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压缩式”工业化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 D.O.CONNER 提出，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仅花费数十年，就完成了早期发达国家经历几个世纪才实现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式”工业化不仅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会发生急剧转变。这一层面的转变得益于“后发优势”，但与东亚传统的文化理念和婚姻家庭观念造成了冲突。

二战以后，韩国、日本和中国等东亚国家均出现“压缩式”工业化的现象。韩国 1962 年宣布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韩国工业化的正式起步。当时韩国工业部门产值占 GDP 比重仅有 19.2%，到 1990 年已迅速上升至 40.2%，农业部门产值占比则由 39.4% 下降至 8.4%。

图 12：1960-1990 年韩国工业部门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迅速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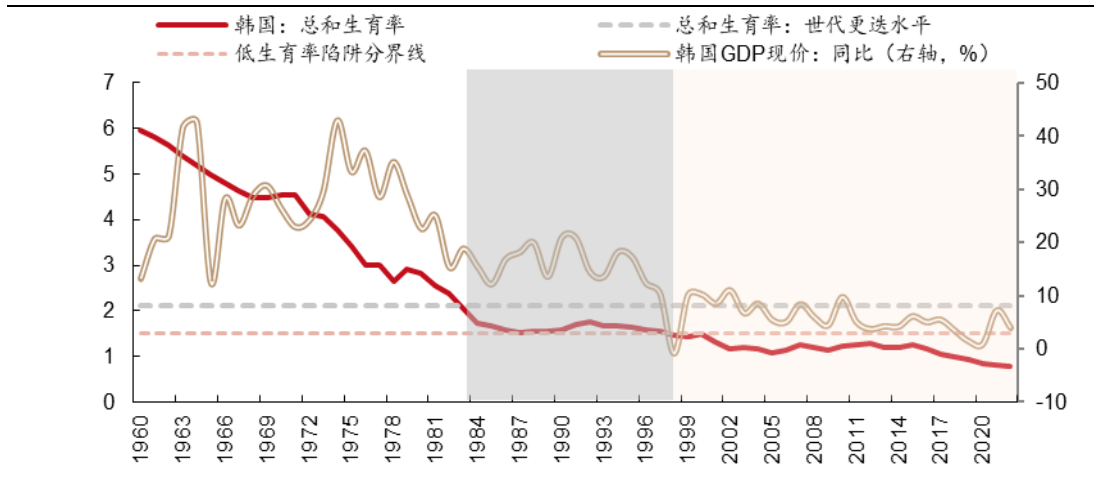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东亚国家“压缩式”工业化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适应需要时间，在“压缩式”工业化的尾声往往伴随着“低生育率陷阱”。以韩国为例，“压缩式”工业化发展进程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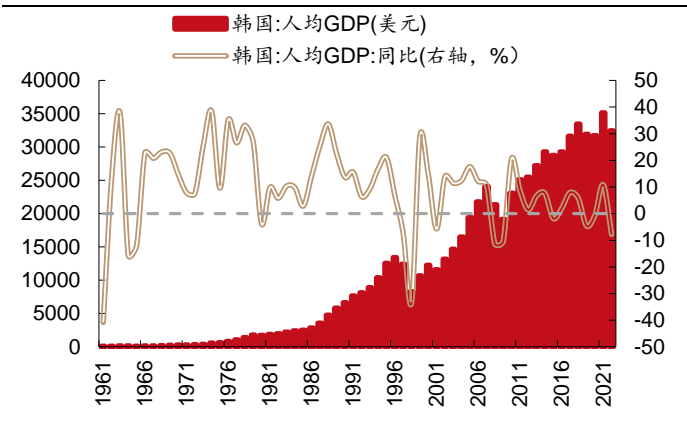
第一阶段：“压缩式”工业化发展期。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韩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主导——轻工业主导——重工业主导”的历程，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的目标。当时韩国人均 GDP 增速保持较高水平，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明显提高。随之而来的是生育观念的变化，如前文所述，工业化的进程将使得家庭的财富流向逆转，进而抑制生育行为。在此期间，韩国总和生育率由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 6.0 左右下降至 2.8，但仍高于世代更替水平。

图 13: 韩国经济增速与总和生育率同步“下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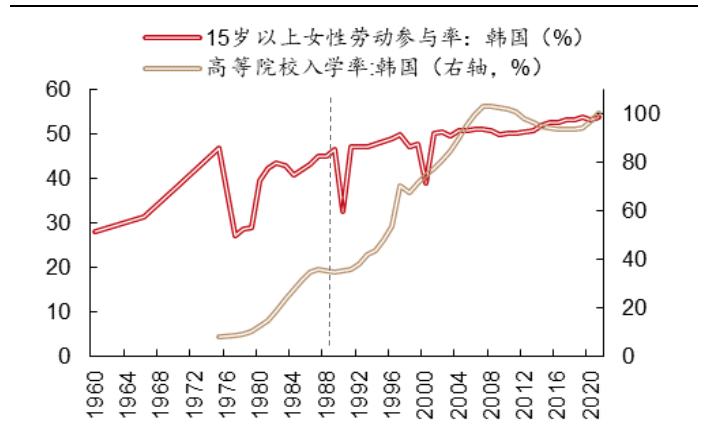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Wind, ifind, 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 14: “压缩式”工业化发展期和成熟期韩国人均 GDP 增速较高



资料来源: Wind, 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 15: 韩国高等院校入学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 Wind, 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第二阶段：“压缩式”工业化成熟期。20 世纪 80 年代，全斗焕政府提出“科技立国”战略，韩国的工业化进程由过去追求“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重点发展产业由资本密集型转为知识密集型。一方面，韩国政府要求纺织、水泥、石化、钢铁、家电、汽车等传统行业进行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韩国政府通过出台产业规划和支持政策，扶持机械、电子、精细化工、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业升级催化了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韩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迅速上升，校外培训也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造成养育子女的成本明显提高。在此期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仅有 1.54，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尚未落入“低生育率陷阱”。

第三阶段：“压缩式”工业化末期。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增速中枢明显下行。此时韩国“压缩式”工业化进程已进入尾声，在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徘徊之时，社会发展趋于停滞，急剧压缩的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问题就会逐渐释放。1998 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首次跌破 1.5 的警戒线，到 2022 年韩国 0.78 的总和生育率已在全球“垫底”。

从东亚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组建家庭和养育子女可谓是“人生大事”，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居民的价值观也有转向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当经济增速放缓，但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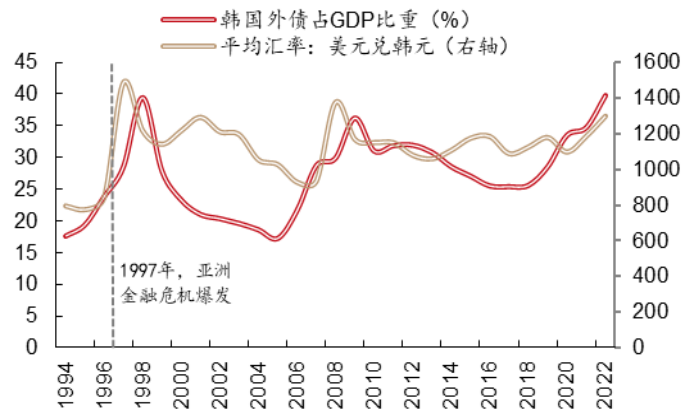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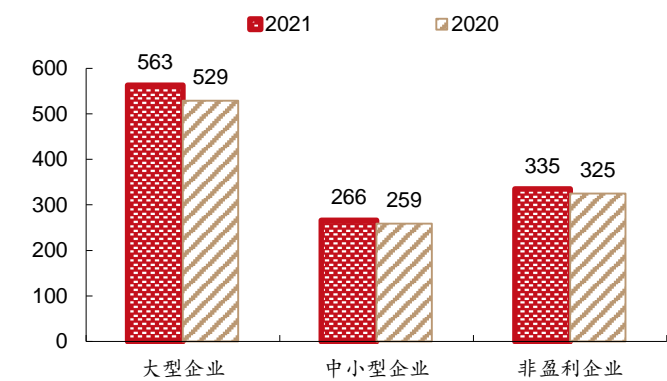
育成本却居高不下，生育后代与降低生活质量划上等号，对固有的家庭和生育观念产生强烈冲击。由于工业化进程的时间被压缩至数十年，使得文化和观念转变能够缓冲的世代显著减少，如果促进生育的政策介入过晚，就很容易被长期困在“低生育率陷阱”之中。

2.1 劳动力市场内卷导致工作时长不断增加

韩国财阀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收入差距增大。20世纪90年代韩国向民主化转型并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政府逐渐失去了对财阀的绝对控制，韩国企业掀起全球并购的高潮，韩国经济逐渐由财阀企业主导。这使得集团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进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2021年韩国大型企业人均工资收入约为563万韩元，中小型企业仅为266万韩元。

图 16：韩国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工资收入差距较大（万韩元）

图 17：韩国外债占 GDP 比重和韩元汇率



资料来源：韩国统计局，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CEIC, ifind, 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按照IMF要求进行“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此前稳定的雇佣制度走向崩溃。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外债占GDP比重接近30%，同时韩元迅速贬值，为避免国家破产，韩国政府为换取IMF提供的550亿美元贷款，不得不接受IMF提出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改革，韩国企业拥有“集体解雇权”和大量雇用“非正规职”（即短期合同、兼职、外包和日度雇佣员工）的权利⁷。此后，大量韩国企业开始裁员，1998年韩国青年失业率飙升至15.9%，此前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标志的稳定雇佣制度走向崩溃。

劳动力市场内卷导致工作时长持续增加，显著抑制韩国生育率。韩国雇佣制度的改革仅针对“非正规职”，这造成“正规职”和“非正规职”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愈发激烈。此外，如前文所述，大型企业的工资收入几乎是中小型企业两倍多，进一步加剧韩国就业内卷程度和社会不平等。为保证收入的稳定，韩国职工不得不持续增加工作时长。2023年韩国宣布将此前的52小时工作制修改为69小时，从OECD披露的数据看，韩国每年人均实际工作时间在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

⁷ 韩国的治理难题：新经济自由主义下的社会妥协

12 | 请务必仔细阅读报告尾部的投资评级说明和声明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85102020024011044>